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国际问题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

PERPLEXIT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LATIN AMERICA

— 苏振兴 主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国际问题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

PERPLEXIT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LATIN AMERICA

苏振兴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苏振兴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004-9103-3

I. ①拉… II. ①苏…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拉丁美洲 IV. ①D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9182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孙元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6.25 插 页 2

字 数 607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在中国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时，国内外的舆论曾传出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已进入一个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如贫富分化、失业激增、经济停滞，等等，甚至不排除发生某种危机的可能性。拉美国家在人均 GDP 由 1000 美元向 3000 美元过渡时期就曾多次发生危机，似乎是上述警讯的一个有力佐证。因此，我们需要系统地考察一下拉美国家在这个阶段究竟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是一种带有拉美自身特色的现象，还是反映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拉美国家何时达到人均 GDP1000 美元，又何时跨越人均 GDP3000 美元？我们初步考察以后发现，要准确地判断这两个时点存在一定的困难。一是拉美各国达到人均 GDP1000 美元或 3000 美元的时间点早晚不一；二是现有的统计资料由于采用的美元汇率不同，彼此差异很大，缺乏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统计数据。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大多数拉美国家实现由人均 GDP1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的跨越大体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

在上述这个时间段内，拉美国家的确呈现出一种危机频繁发生的特点，先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我们称之为“参与危机”；接着是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的深层背景是结构性发展危机；90 年代以来连续发生金融危机。1982 年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也将拉美地区自 1950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1950—1981 年保持了 30 年的持续增长（年均 5.3%），而 1981—1990 年年均增长率仅为 1.3%，1991—2000 年则为 3.3%，从而出现长达 20 年的经济衰退与低迷。实际上，90 年代的经济低迷一直延伸到 2002 年。

考虑到拉美经济周期变动的客观情况，我们在本书中考察的时间段是1950—2002年。从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演进过程来观察，1870—1930年是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初级产品出口繁荣及早期的工业发展，各国普遍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1930—1950年是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即在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冲击下，部分拉美国家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探索阶段；1950—1980年是现代化的第三阶段，因拉美各国都被卷入进口替代工业化大潮而形成战后的工业化高潮期，社会转型也普遍进入加速期；1980年以后，拉美地区因结构性发展危机的爆发而进入一个结构调整阶段，期间，拉美国家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结构改革，实现了由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由国家主导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从2003年起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扩张周期。这第四个阶段是否以2002年作为终结，现在还难以定论。

拉美国家为何在进入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以后连续发生危机？这正是我们所关注的“社会转型期的困惑”。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认真研究拉美国家的这些危机究竟因何而发生。

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在工业化大潮推动下正处于良好的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参与危机却不期而遇。引发这场危机的原因大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这场危机的发生确实与拉美国家当时所处的达到或接近人均GDP1000美元这个特定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已经相当严重，1970年前后，拉美地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0%。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曾指出：“这里呈现出的矛盾是非常严重的：一极是繁荣以至富足，另一极则是持续的贫困。这是一个排斥性的体系。”^①广大基层民众对国家现代化发展长期以来所抱的期待逐渐落空，从“希望的革命”转向了“失望的革命”。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结构性失衡的制约。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发展模式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后期，由这种发展模式引

^①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页。

起的结构性失衡现象陆续在一部分国家显现出来，例如，非耐用消费品生产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限制，工业部门创造就业的能力下降；产业升级不仅面临投入高、产出少、效益低的前景，而且主要靠国际融资；长期依赖农、矿产品出口为工业化进程提供外汇支持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当时除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极少数石油出口国外，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因 1973 年的国际石油危机而陷入国际支付困境。这些因素大大削弱了拉美各国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实际上，随着国际石油危机的爆发，拉美国家已经面临结构性发展危机，然而，当时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量“石油美元”却缓解了拉美国家的资本饥渴症，从而推迟了结构性发展危机的爆发点，也延缓了对发展模式的调整。

第三，古巴革命对这场危机的爆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59 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对其他拉美国家人民群众争取权益的斗争和拉美的游击中心运动客观上产生了一种鼓舞和推动作用。西方舆论界和拉美的保守势力曾把这场危机归咎于古巴“输出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显然不符合实际，目的是借此进行反共宣传，孤立古巴。事实上，早在 1960 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就决定在拉美推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并一反常态地鼓励拉美国家进行社会变革，说明美国也看到了拉美国家存在爆发危机的主观条件；部分拉美国家的反政府游击队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席卷拉美的军事政变浪潮是作为这场危机的应对措施而出现的政治现象。实行军事独裁和武力镇压是拉美右翼军人政权的共同特点，但也有一些国家的军人政府力图在军事威权统治下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反映出它们对结构性发展危机的认知。因此，这场危机也导致了拉美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和民主的倒退；军人政权的专制与镇压虽然暂时“平息”了社会冲突，却加剧了军队与文人社会之间的矛盾，因而又有 1978—1990 年期间军人政权“还政于民”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军人政权启动的结构改革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却把这场改革引向了新自由主义的轨道。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实际上就是上面所说的结构性发展危机带来的后果。1973 年国际石油危机后，拉美国家利用大量“石油美元”回流到国际资本市场的有利条件，纷纷走上“负债增长”之路。大规模借债使拉美国家在 70 年代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却酿成了 80 年代的债务

危机。为应对国际支付危机，拉美国家不得不进行“应急性”调整，扩大初级产品出口，严厉压缩进口，以获取贸易盈余来偿还债务，结果导致工业化倒退、恶性通货膨胀和 10 年经济衰退。

90 年代的经济改革本来就是在非常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误导更使这场改革险象环生。1994 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1999 年巴西发生货币危机；2001 年阿根廷发生由债务问题引起的全面性经济危机。每一次危机都对整个拉美地区造成冲击，使地区经济从 90 年代初期较高的增长水平上逐步跌落下来。金融危机当然有国际因素的影响，但内部因素是主要的原因。当时，拉美国家普遍采用“汇率锚”或货币局制度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导致本国货币大幅度升值；快速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开放资本账户等改革举措，引起外来商品的激烈竞争和短期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并引发连续性的金融危机。可以说，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主要源于政策失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拉美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世纪末的 30 多年间这种危机频发的现象，是在拉美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和特定的发展模式下出现的，是一种具有拉美特色的现象，而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60—70 年代的参与危机虽然与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有联系，但我们认为，不能过分看重人均 GDP1000 美元这个“量化”指标。例如，这场危机发生时，许多拉美国家还没有达到人均 GDP1000 美元。这类参与危机会不会发生，主要取决于社会冲突的尖锐程度，也取决于政府的敏感性和处置能力。这类危机不会都以达到人均 GDP1000 美元为爆发点，也不会因为实现了人均 GDP3000 美元就自动化解。

拉美一些学者在分析社会危机时采用所谓“矛盾叠加”的论点。意思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内源性现代化，往往是在某个特定的阶段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前后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与渐进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现代化，往往受到初始条件不足的制约，“起飞阶段”刚刚到来，各种社会问题就接踵而至，诸如就业问题、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多种矛盾叠加在一起，解决的难度极大。从发展中国家这种带普遍性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达到人均 GDP1000 美元之后可能会面临一个社会矛盾高发期”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主导发展进程的政府或政党需要对这种复杂局面有充

分的认识,要及时采取措施去化解各种矛盾,避免因酿成危机而使国家的发展进程遭受挫折。

如前所述,1970年前后,拉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0%,经过30年之后,拉美的贫困人口依然占总人口的40%左右,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呈现出很强的刚性特征。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和80年代以来持续20年的经济衰退与低迷分不开,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拉美国家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存在两个重大的障碍。一是长期忽视观念与制度的变革,很难形成真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二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长期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偏好,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自然而然地导致社会公平。

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内向发展模式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债务危机爆发的1982年,可谓“50年一贯制”。从50年代后期一些国家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开始,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进行过一些结构改革的尝试,但始终没有任何一个拉美国家真正从这个旧模式中摆脱出来。如普雷维什所说,人们已经形成一种进口替代的“惯性”。这里所说的拉美国家的“结构性发展危机”就是一种原有的增长方式已经失效,而又不坚决地去进行结构调整所导致的危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在相对短暂地实行进口替代模式之后,及时地转入外向发展模式,其发展水平在20世纪60—70年代迅速地超越了拉美国家。拉美的这个历史教训是相当深刻的!

本书的内容布局分为三个部分。“总论”部分(第一—二章)系统论述拉美国家1950—2002年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变化,重点分析了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或称“参与危机”)、80年代的债务危机及其深层背景——结构性发展危机、90年代以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货币危机、阿根廷经济危机等多次危机的前因后果。“分论”部分(第三—十章)从研究拉美国家关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社会政策的演变入手,着重分析了收入分配、社会分层、劳动力就业、教育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治安状况等主要社会领域的情况。“专题”部分(第十一—十四章)着重选择了4个专题进行研究,即巴西区域发展失衡及其治理;阿根廷为何从100年前世界主要富国之一的地位上跌落下来;拉美国家城市化“超前”现象带来的后果;拉美国家

在外向发展模式下取得的经济与社会效果。

尽管我们的课题组在这项研究中付出了不少辛劳，但由于水平所限，书中可能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错误，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苏振兴

2010年3月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社会转型和“参与危机”.....	(3)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4)
第二节 参与危机及其表现	(12)
第三节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失衡	(20)
第四节 扩大政治参与的困境	(26)
第五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的军人政权	(35)
第二章 结构性发展危机与结构改革	(42)
第一节 结构性发展危机	(42)
第二节 结构改革的成效和问题	(49)
第三节 拉美三次金融危机评析	(66)
第四节 政治民主化进程与“民主赤字”	(77)
第五节 关于“拉美化”的再思考	(88)

第二编 分论

第三章 拉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关系.....	(101)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演进.....	(101)

第二节	拉美增长周期与改革进程·····	(109)
第三节	经济波动下的社会发展·····	(117)
第四节	对拉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解释·····	(135)
第五节	智利处理增长与发展关系的启示·····	(142)
第四章	拉美的发展思想与社会政策演变·····	(154)
第一节	发展思想与社会政策·····	(154)
第二节	拉美社会政策模式形成的雏形阶段·····	(157)
第三节	结构主义及其国家计划型社会政策模式·····	(159)
第四节	新自由主义及其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模式·····	(162)
第五节	新结构主义及其对社会政策模式的探索·····	(168)
第六节	关于拉美发展思想与社会政策演变的启示·····	(173)
第五章	拉美地区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探源·····	(178)
第一节	拉美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	(178)
第二节	拉美地区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	(183)
第三节	拉美地区收入分配不公的影响及启示·····	(209)
第六章	拉美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	(220)
第一节	拉美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分层化·····	(220)
第二节	拉美社会结构变迁:阶级的视角·····	(230)
第三节	拉美国家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趋势固化的原因·····	(241)
第四节	社会分层化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247)
第七章	拉美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政策·····	(256)
第一节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劳动力基础特征与就业背景·····	(256)
第二节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转移·····	(269)
第三节	拉美劳动力市场发育与改革·····	(281)
第四节	关于拉美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思考·····	(290)
第八章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拉美的教育与社会不公·····	(297)
第一节	教育与社会公正问题研究概况·····	(297)

第二节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拉美的教育发展及问题	(300)
第三节	拉美教育与社会不公正	(313)
第四节	拉美教育—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分析	(318)
第五节	关于拉美教育与社会不公的启示	(325)
第九章	拉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328)
第一节	20 世纪 80 年代前社会保障的发展历史和问题	(328)
第二节	80 年代以来的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历程	(341)
第三节	拉美社保制度改革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	(355)
第四节	关于拉美社会保障改革的启示与思考	(359)
第十章	拉美社会治安的危机	(363)
第一节	令人堪忧的社会治安形势	(363)
第二节	社会治安恶化的主要原因	(369)
第三节	青少年犯罪现象透视	(382)
第四节	社会治安恶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390)
第五节	社会治安的治理	(395)

第三编 专题

第十一章	地区发展不平衡及其治理——巴西案例研究	(405)
第一节	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405)
第二节	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演变	(420)
第三节	巴西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经验	(428)
第十二章	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阿根廷案例研究	(440)
第一节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440)
第二节	70—80 年代贫困化的加剧	(446)
第三节	90 年代贫困化的特点与原因	(451)
第四节	贫困化带来严重后果	(463)
第五节	危机爆发后的应急措施与政策调整	(467)
第六节	关于阿根廷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的思考	(471)

第十三章 城市化、城市治理与“贫困城市化”	(475)
第一节 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点	(476)
第二节 拉美城市化模式对社会转型过程的不利影响	(487)
第三节 拉美国家城市贫困现象的演变	(497)
 第十四章 拉美发展模式转型的经济与社会效果	(507)
第一节 拉美发展模式转型的背景	(507)
第二节 拉美发展模式转型下的主要政策调整	(511)
第三节 拉美发展模式转型的经济效果	(515)
第四节 拉美发展模式转型的社会效果	(526)
第五节 对拉美发展模式转型的经济与社会效果的思考	(537)
 结束语	(541)
 本书作者介绍	(551)
 参考文献	(553)

第一编

总 论

第一章

社会转型和“参与危机”

——对拉美国家 1950—1980 年发展进程的考察

在拉美国家的发展史上，1950—1980 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战后初期，在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的背景下，“以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的思想在早已取得政治独立的拉美国家尤其具有影响力。1950 年前后，以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思想问世。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拉美结构主义理论以“中心—外围”论和“贸易条件恶化”论作为分析框架，论证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得出了拉美国家必须坚持走工业化道路的结论，并在总结部分拉美国家自 1930 年以来发展现代工业的经验基础上，将进口替代工业化提升为一种适合于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工业化的浪潮，拉美地区出现了以工业化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繁荣局面。1950—1980 年，拉美地区经济保持了年均 5.3% 的增长率（见表 1—1）；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在 1950 年基础上增加三倍；在地区总人口增加一倍多的情况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然翻了一番。1977 年，地区人均 GDP 达到 798 美元（1970 年美元价格），^① 其中，一批国家实现了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的重要跨越。

* 在中国学者的文章中，“拉美国家”这一概念通常将加勒比国家也包含在内。本书的研究范围不包含 1960 年以后才相继独立的加勒比 13 国。

① CEPAL, *América Latina en el umbral de los años 80*, Santiago de Chile, 1980, p. 6.

表 1—1 1950—1990 年^a拉丁美洲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

国别/年份	1950—1960	1960—1973	1973—1981	1950—1981	1981—1990	1950—1990
阿根廷	2.8	4.0	1.2	2.9	-0.6	2.1
巴西	6.8	7.5	5.5	6.8	2.3	5.8
智利	4.0	3.4	3.6	3.6	2.5	3.4
哥伦比亚	4.6	5.6	4.5	5.0	3.9	4.8
墨西哥	6.1	7.0	6.6	6.6	0.8	5.3
秘鲁	5.5	4.8	3.8	4.8	-1.7	3.3
委内瑞拉	7.6	4.7	-0.1	4.4	0.6	3.5
小国 ^b	3.6	5.4	4.3	4.5	1.2	3.8
拉丁美洲	5.1	5.9	4.5	5.3	1.3	4.4

注：a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数字按 1970 年美元价格计算，1970—1990 年的数字按 1980 年美元价格计算。b 包含 12 个国家。

资料来源：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统计处。转引自《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第六卷（上），第 189 页。

然而，在良好的经济背景下，拉美国家的社会、政治局势只保持了大约 20 年的相对平静。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社会与政治动荡局面不断加剧，并逐渐由部分国家的乱象演变成一场地区性的“社会—政治危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拉美国家的这段经历能给人们留下哪些启示？这些是本章力图要回答的问题。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如前所述，1950—1980 年是拉美工业化的高潮期，地区工业年均增长率为 6.5%。强劲的工业化进程推动着社会加速转型。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50—1977 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变化如下：农业由占 19.8% 降为 11.7%，工业由占 29.4% 上升为 36.7%，服务业由占 51.0% 上升为 51.7%；其中制造业产值由 18.8% 上升到 25.2%。^① 可见，这个

^① CEPAL, *América Latina en el umbral de los años 80*, Santiago de Chile, 1980, pp. 15—16.